

经济圈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
经济和科技

(美)巴里·诺顿 主编 贾宗谊 贾志天 译

The
China
Circle

BARRY NAUGHTON,
EDITOR

新华出版社

经 济 圈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
经济和科技

(美)巴里·诺顿 主编

贾 宗 谊 译
贾 志 天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和科技/(美)诺顿主编;
贾宗谊、贾志天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

ISBN 7-5011-4283-1

I. 经… II. ① 诺…② 贾…③ 贾… III. ① 经济技术合作-中国,大陆、香港、台湾②科学技术合作-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IV. F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5190 号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Copyright ©1997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本书版权属布鲁金斯学会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经 济 圈

[美]巴里·诺顿 主编

贾宗谊 贾志天 译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83-1/F·615 定价:24.8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并逐步赶上美国的经济水平。到80年代,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也实现起飞,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正是这样的推动力,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也逐步变为竞争的重心。本书作者长期关注这样的现实,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特别是广东、福建)、香港、台湾在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体现于电子工业上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进而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中华圈”。全书以电子业为契入点,阐述了“中华圈”的出现和未来的发展;分析了其分工合作的投资和贸易关系,美国、日本、东盟与“中华圈”合作和竞争;探讨了美国、日本以及华人华侨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在当今,信息产业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增长点,也是衡量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因而此书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书中“中华圈”的提法,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但纵观全书,可以发现,所谓“中华圈”,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考虑的。因此,译者尊重作者“中华圈”的提法。使用“中华圈”一词,基于这样一些因素:1.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理上的联系,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过程中造就的互补性;2. 电子业分工在这一区域既是合理的,也是有活力的,它使这一区域的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加强;3. 有利于对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新华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2月

序 言

在过去的 15 年中,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区域。这个区域常常被人称作“大中华”,不过,东南亚的一些邻国对这个词有反感,所以本书把它称作“中华圈”。这个区域推动东亚的投资、生产和贸易急剧增长。

本书讲述了在政治障碍减少以后,中华圈是如何在经济互补的刺激下形成的。公司,特别是中小型家庭公司,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政府的政策则起了第二位的推动作用。日本在这个区域的承包网络组织得十分严密,而中国的公司则是在开放而灵活的网络中联系起来的,特别是电子产业的公司,更是如此。这些网络往往是由美国公司领导的。事实上,本书的作者们惊奇地发现,美国和中华圈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系,这使双方都受益。但经济联系的加强并没有消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政治上的对立,也没有缓解由于香港回归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捉摸不定。作者从区域的角度观察了中华圈,表明这个新的强大力量对东南亚和日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本书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想要从它同台湾和香港的商业联系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好处,它就必须深化改革。本书最后作出这样的预测,大陆市场的开放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力,使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达到新的、历史上空前的高度”。

本书的各个章节导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一项关于中华圈内部正在发展的经济联系将对整个亚太地区

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国际研究课题。这个项目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财政支持。本书的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问题研究生院巴里·诺顿教授同我一起领导了这个项目。他出色地协助对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卓越工作人员、主笔詹尼弗·波内尔、特别是亚洲政策研究员迈克尔·斯坦凯维奇的手稿进行了加工。

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南希·戴维森对本书多次修订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尼古拉斯·拉迪、特黑、麦吉和一位匿名的评论者对早期的草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乔尼·哈伦和卡罗琳·拉利尔费神进行了大量文字编辑工作。所有这一切，对本书帮助极大。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为本书辛勤工作的出版社其他人员吉尔·伯恩斯坦、德博拉·斯泰尔斯和苏珊·伍伦，对本书进行校对的卡洛塔·里巴，和为本书编制索引的朱莉娅·佩特拉基斯。

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

苏珊·舍克

1997年6月

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目 录

序言

苏珊·舍克	1
-------------	---

导 论

1. 中华圈的出现	
巴里·诺顿	3

第一部分

2. 香港和中华圈的经济一体化	
宋云文	45
3.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政策改革	
巴里·诺顿	88
4. 中国和东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工业化竞争	
简檀孔	120

第二部分

5. 听任自生自灭:亚洲生产网络和美国电子业的复兴	
迈克尔·博拉斯	151
6. 台湾海峡两岸的分工:对电子业的宏观概述和分析	
椿钦	182

7. 是中华圈的伙伴吗？——日本电子公司在东亚的生产网络
迪特尔·厄恩斯特 238
8. 中华圈和中国电子业的技术发展
让-弗朗索瓦·于歇 291

结 束 语

9. 中华圈的未来
巴里·诺顿 329

附 录

- 撰稿人名单 345
- 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简介 346
- 本书译名对照表 347

导论



第一章

中华圈的出现

巴里·诺顿

由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的出现某些方面是经济对政治的胜利。这三个完全不同政治体制的地区今日变成了一个进行贸易和生产的经济区域,尽管存在着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冲突以及长期的、根深蒂固的猜疑和不信任。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一些个人在本身利益的驱动下,不经政府批准,有时甚至藐视政府的控制和限制,建立了许多跨边界的公司,组成了广泛的生产和贸易网。促使这三个地区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的动力显然是经济因素。

不过,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政府政策的演变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长期政策的修改在容忍所出现的经济关系方面至关重要。的确,在某些方面,政府几乎像私人工商业一样,积极主动地促进和激励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可以看到,政府像公司一样,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了反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既提出了新的挑战,又提供了新的机遇。再者,正如1996年引人注目的台湾海峡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激烈对抗的背景下,经济关系仍然继续开展。这种争夺合法性、争夺经济的和政

治的活动空间的斗争有时可能升级为公开的军事对抗。

在形成这种经济区域方面,政府政策和私人行动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因此,在对待本书中的材料时,不能采取通常那种态度。传统的态度认为,经济是受它自己的政策机制管束的。当某种经济同其他经济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时,在分析“国内”经济和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国际”意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种态度对中华圈显然是不适当的。中华圈的所有经济区域的公司都深深卷入了跨边界的网络。许多公司很清楚在对方管辖区的可能的伙伴和地点。在某种程度上,中华圈的公司都位于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这个经济区域被政治边界分割开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消退,这个休眠状态的经济区域的潜在意义大大提高了。一旦限制被取消,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便爆炸性地增长了。能量和竞争环境的变化驱使公司的决策和政府的政策也发生变化。

本书的目的是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和公司作出决定的角度两个方面对中华圈经济区域的出现进行论述和分析。本书第一部分的三章从比较传统的视角探讨了中华圈的出现。我们对这个视角作出了适当的修改,以体现中华圈的特殊的特点。这三章主要研究了三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而作出的修改。本书第二部分的四章在出现中华圈和世界电子行业的大背景下探讨了电子业这个具体的行业。这个具体行业的案例研究使我们可以谈得具体一些,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可以变换视角。中华圈经济内部的巨大变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圈以外的条件所驱动的:跨国生产网络(特别是日本的、美国的和华人的生产网络)、技术能力的变化,以及产品市场和竞争条件的变化。不联系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就无法理解中华圈的出现。本书的最后一章对中华圈在其近几年爆炸性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简要的评估。

中华圈的内涵是什么？

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华圈，而是一系列以香港为中心的同轴经济圈。正如宋云文(第二章)所指出的，不管对中华圈下什么样的定义，香港的多经济功能使它具有了毫不含糊的中心地位。由于这个缘故，宋对香港的经济数据进行的仔细分析和分解是理解整个中华经济圈的必要前提。中华圈的甚至最小的圈也超越了政治边界。至于较大的圈则包括许多不同的政治管辖区。中华圈的根本特色是存在跨越政治边界的经济联系。近期经济活动的增长往往重新创造了“天然的”经济区域，在此以前，这些区域似乎被政治上的分裂永久地分隔开来。^①

最小的圈包括大香港都市区。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这个区域扩展了，在地理上变得多样化了。包括金融、广告、通讯以及大多数公司总部在内的商业服务业仍然留在中心商业区，而大部分制造业则迁移到周边的郊区。这个过程属于城市发展的常规范畴，但由于香港的周边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界以内，这个过程就具有了国际含义。迄今为止，香港商人的大部分制造业迁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

其次一个最大的圈包括台湾、香港和华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贸易和投资的大批流量反映了这些区域之间的分工变得日益复杂。这些区域现在的特点是通常要跨越政治边界的生产链条。这些生产场地之间进行的中间商品贸易占这个圈的总贸易额的很大比例。这个区域制造业网络高度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现在显然构成一个经济区。不过，在其他方面，经济一体化仍然受到重要的限制。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资本流动有许多障碍。关税很高(不过，为面向出口的生产而进口的材料和元件一般可以免税)，外汇风险仍然存在。甚至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它仍

然是一个单独的关税区,保持单独的货币,控制移民。

第三个同轴圈把所有的中国经济都结合到大东亚区域的框架内。对这个圈,也许最好认为它是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区域。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投资绝不仅仅限于广东和福建,而且正沿着中国大陆沿海向北发展。来自日本,以及最近来自韩国的投资,最初局限在北部沿海的山东和辽宁两省,现在日益扩展,正向南部发展。这两股资金沿着海岸流动,汇合于上海、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省市,并在那里重叠。这些省市一向是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省市近来重新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现在它们全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吸引着大量外国投资。由于这些趋势,中国整个沿海地区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沿海省市同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日益加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把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结在一起。这些贸易和投资往往是由华裔商人进行的。阎檀孔(第四章)说,香港和台湾已经属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之列。台湾在越南和菲律宾发挥着更加明显的作用。由此可见,导致加强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联系的那些经济力量同样也在促进香港、台湾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正如阎檀孔所说,其结果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特别是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利的一面。这些日益密切的交易网络是否构成一个经济区域,现在作这样的断言,为时尚早,但是,它们肯定表明了将来中国整个沿海地带是会融合到大东亚的和世界的经济中去的。在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中,香港和台湾将起关键性作用。

所有这些关于中华圈的界定,从经济观点来说,没有一个是唯一正确的。恰当的界定取决于所要回答的问题。不过,第二个圈——香港、广东、福建和台湾——是最引人注目和令人惊讶的现象:生产网络的密切一体化是在没有任何培育全面经济一体化的机制,而且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重大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

最值得注意的中华圈近几年来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1985年,台湾、香港和广东、福建两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8%;而到1995年,它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6%。^②即使考虑到这种出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归因于三个辖区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在世界贸易活动中所占份额有如此大的增长,也是引人注目的。再者,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区域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生产中心,涉及广泛的产业,从玩具、服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高精尖产业。在电脑产业中,中华圈是世界上第三个最重要的生产者和出口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迅速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使广东、福建两省改观,其影响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对中国其他省市的影响。自1993年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非常之大的。据官方统计,已经实现的外商对华投资从一无所有逐步发展到1991年的50亿美元左右,到1993年猛增到280亿美元。自1993年以来,资金的流入不断增长,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在1996年已超过400亿美元。然而,历年对广东、福建的外商直接投资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中国其他地区的五倍之多。这意味着,自1993年以来,每年流入这两省的资金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年率。在贸易方面,同样存在质的区别:1994年,广东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福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出口仅占13%。^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两者比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更紧密地同香港和台湾一体化,至少从商品的流量来判断,是如此。^④

在促进中国各省融入世界经济方面,香港一直发挥着中介作用。此外,香港的效率和广东、福建经济的自由化吸引着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和生产进入中华圈。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国际贸易经济中心从南方转移到了香港。在第二章中,宋云文对香港贸易和投资数据的分析表明,香港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在绝对值和相对值方面都增加了。除此以外,宋云文还用数据描述和剖析了香港作为

转口贸易中心、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的作用。1997年7月1日香港在政治上合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会改变这些使香港成为华南地区经济首府的根本性经济因素,但是,新形式的政治风险将出现。

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中华圈是在中国经济面对的根本经济环境发生三个变化以后出现的。这三个变化对所有发展中的经济都有影响,但对中华圈的影响更为直接。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型工业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功。第二个变化是,交易和运输费用的降低使得有可能把生产链条中的一段环节迁移到工资低的地方。第三个变化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原料价格的暴跌使得习以为常的、以原料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东亚货币的重新调整,首先是在普拉扎协议之后日元于1985年的升值,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变化,以适应环境的不断改变。这些环境的改变又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外部条件。这是出现中华圈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出现中华圈的基础是台湾和香港在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既有示范作用(因为中国竭力仿效它们的成功做法),也有改革作用(因为出口的过剩、成本的增加和币值的调整强烈地促使人们把生产转移到工资低的地方)。这些趋势在80年代中期币值调整之后达到了最高点。日元在1985年至1988年期间大幅度升值,台湾货币追随日元也在1986年以后升值。为了对付迅速提高的工资和劳动力的日益短缺,以及土地和环保费用的增加,香港和台湾(以及日本)的商人设法重组现有的出口生产网络。此时中国对外界的投资开放门户,从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把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那里的工资极其低，土地和经营费用也比较低。在第三章，我阐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变革和政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两地的政策都是在经济变化的驱动下进行改革的：中国大陆对摆在眼前的一个机会作出了回应，而台湾则既要对以前的成功所形成的改革压力作出反应，又要对大陆提供的新机会作出反应。在第四章，阎檀孔强调说，这些力量在整个东亚都在发挥作用，它们明显地形成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发展态势。

利用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对台湾和香港的商人特别有利，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成本是比较低的。正如宋云文在第二章中所说，一旦大陆的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由于地理上毗连，再加上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大陆做生意是比较容易而且便宜的。^⑤此外，由于经营费用低，就有可能在最初阶段只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大陆，而把其他环节仍然保留在香港或台湾。跨越政治边界的生产链条很快建立起来了，从而使香港和台湾可以专门从事高附加值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而把大部分一般化的制造业迁移到中国大陆。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就造成中国沿海地区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香港和台湾可以保持快速的增长，并获得比较高的收入。把现有出口生产网络改造成更大的低成本网络，这是现在分工的基础。^⑥

中华圈成员之间交易费用的大幅度降低，反映了中华圈特有的政治变化，但同时也是世界趋势的一部分。国际交易费用的降低是促成中华圈的经济环境中的第二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费用降低，出现了行业内部贸易增加的全球趋势，伴随而来的是公司内部贸易的增加以及投资的增加。

换句话说，出现了把生产环节在地理上分散开来的全球性趋势。结果是，中间商品和生产设备在国际贸易中占了越来越大的份额。^⑦随着国际交易费用的下降，下面这种做法变得有利可图了：